

自2003年起，本刊被列入中國教育部規定的CSSCI即「中文社會科學引文指標」刊物，並且隨着網絡通訊日益普及，本刊每日收稿量大增。特別令人高興的是來稿中不少是攻讀博碩士學位的年輕學子，編者深受鼓舞。這雖然令本刊收發及按程序審稿等工作量大增，但我們仍然堅持認真為作者和讀者服務。需要說明的是，為了分散印刷版的壓力和限制，我們增設網絡月刊，刊登經審稿的原創稿件；也希望作者能理解和支持這一措施。

祝各位2005年取得更好成績並繼續支持本刊。

——編者

執政者如何面對社會衝突？

近年來農村的群體性維權事件日漸增多，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是不容迴避的問題。于建嶸的〈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民維權抗爭〉（《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一文對此作出了可貴的探討。他指出：「目前農村的社會衝突作為轉型社會的必然現象，其所形成的社會政治壓力有可能成為改革的契機，又可能成為社會動盪的根源，而決定性因素則在於執政者能否真正認識農民維權抗爭的本質和意義。」我贊同他的這一結論，但覺得其意猶未盡。

執政者如何對待農民的維權抗爭，這不完全是一個理性認識的問題，而更多的是利益取捨的問題，或者說，是力量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博弈的問題。在當代中國，參與博弈的至少有五股重要力量：高層執政者，中下層官僚，民間實力派精英，知識份子，普通民眾。我認為，要和平公正地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高層執政者、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的聯盟，即執政者把來自民間的壓力當成是促成自身改革的動力，借助於民間的抗議力量來壓制中下層官僚的自利傾向和統治階層中的保守勢力。但執政者要作出這一抉擇，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自信。如果依然堅持「穩定壓倒一切」，把各種衝突都當成是對自己統治的威脅，動輒就定性為「動亂」，那只能使民間的積怨愈來愈深，卻勢難避免社會崩潰。但統治者如果順應時代潮流銳意改革，改革可能改到自己頭上，從而失去統治地位。所以，這又是兩難的選擇。

兩千年來，中國一直還沒有找到如何解決社會衝突的妥善途徑，無論是堵還是疏，都要靠最高統治者。今天，我們終於明白憲政民主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機制，然而如何實現憲政民主，我們仍然不得不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良知與勇氣。

王志泉 南充
2004.12.29

中日「新冷戰」

從內藤康的〈日本傳媒視野中的中國〉一文（《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中論述到的「亞洲杯」事件，我感到中日兩國陷入了「新冷戰」的泥潭。雙邊關係持續惡化，而且毫無改善迹象。在某些中國人眼裏，參拜靖國神社、東海能源之爭、終止對華援助、游說歐盟維持對華武器禁運、《新防衛大綱》的出台、李登輝訪日、傳說中的達賴喇嘛訪日計劃，一連串事件表明日本正連續攻擊中國的「軟肋」，雙邊關係的倒退發展到了行動層面。

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考量，政府意願、傳媒態度和民間情緒是影響政策制定的三大因素。意見領袖及其賴以生存的大眾傳媒對輿論的塑造發揮着主導作用，因為今天的大眾傳媒不僅「銷售事實」，它還以評論、訪談等形式「銷售觀點」，進而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力量。比如，由於日本《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主流媒體的鼓動，日本民間和政府對東海能源問題上態度漸趨強硬，日本政府最終轉變了原先不將這個問題作為向中國交涉的正式議題的態度。

缺乏互信的雙方會把本來中性的信息誤讀為具有否定性甚至攻擊性。日本的知識精英在分析中國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時有諸多誤判之處，而這些誤判又反過來刺激了中國人的不滿和對抗。

中日交惡，兩國受害；中日對抗，何人受益？針對兩國關係惡化的現實，日本前外相川口順子希望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都能向前看。在這一觀點上，川口順子顯示出了外交家的睿智。但如何破冰？當務之急是，雙方的政客、媒體和意見領袖不要繼續激化矛盾、誤導民眾。

畢研韜 海口
2004.12.30

意識形態化的岳飛敘述

孫江、黃東蘭的〈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向讀者描繪了一幅自南宋以降各朝代由官方主導的岳飛敘述的變遷「路線圖」。岳飛敘述的主題變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由來已久的以意識形態凌駕歷史敘事的積習。在意識形態化的岳飛敘述中，「敘事」與「歷史」貌合神離，岳飛由一名有血有肉的人物被各個時代的統治當局塞入不同主題，最終被塑造成為體現其政治正確性的意識形態符號。「岳飛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岳飛是誰的岳飛」。只要當下的意識形態需要，岳飛可以被敘述成忠孝雙全的道德楷模，或者是抵禦外敵的民族英雄，甚至是鎮壓農民起義的階級敵人，與這

一符號意義無關或相抵觸的史實，理所當然被意識形態之網過濾乾淨，驅逐出官方主導的公共記憶。

其實，豈止岳飛敘述如此？單就近代而言，「洪秀全敘述」、「義和團敘述」、「陳獨秀敘述」……又何嘗不是由意識形態之筆肆意塗脂抹粉？政治需要從歷史中找尋意識形態代言人，借「史」還魂，以昭示其統治合法性的歷史血脈，「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意識形態通過對歷史的拆解、過濾、修剪、拼湊，將歷史重構成一面公共記憶的鏡像。直到當下的意識形態語境發生逆轉，這面鏡像又被打碎、重組。

近年來有些民間學者自發對部分歷史人物作出了「翻案」式評述，從某個角度來說，我認為這是對過去被意識形態塑造的歷史敘述的矯正，是向歷史本來面目的回歸。但這種矯正敘述隨時都有可能受到意識形態的干預。電視劇《走向共和》不是草草收場了嗎？

吳鈞 廣州
2004.12.27

日本模式難成東亞儒教近代化的出路

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以歐美資本主義為藍本的近代化歷程，東亞各國究竟應如何再認識儒教這種土產的思想資源？黑住真〈近代化經驗與東亞儒教——以日本為例〉（《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嘗試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黑住真認為，日本對於中國儒教的吸收方式，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有選擇地吸收、消化和再發展。因此，在日本儒教中，日本本身「神道性的東西」以及強調實用的法家思想傳統佔有重要位置，而在中國儒教的核心價值「仁」則被相對淡化。也恰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在十九世紀弱肉強食的國際形勢下得以生存，並成功向歐美資本主義近代化模式轉型。

我認為，日本模式很難成為東亞儒教近代化的出路。首先，因為日本儒教缺乏道德意義上的終極關懷，這正是今天日本在是非善惡的問題上沒有原則和模糊化的根源。因此，如果把日本近代化作為東亞儒教近代化的學習榜樣，無疑將是道德的倒退。

其次，能否將日本的價值系統標識為儒教也是個問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本問題專家塞繆爾斯(Richard J. Samuels)認為，日語中的「不安」一詞，最能體現日本民族對於其生存環境的焦慮感和危機感，顯示出日本對於求存的高度重視。因此，日本儒教與其說是儒教，倒不如說是日本基於生存原因本身的價值系統對儒教的選擇性模仿。因而，我認為中韓這兩個傳統儒教國家，如想從日本經驗中尋找儒教的近代化出路，除非把自己變成另一個日本，或者再來一次「共榮」。

張望 香港
2004.12.26